

钱穆

钱穆作品系列



庄老通辨

庄老通辨



钱
穆
作
品
系
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老通辨/钱穆著. - 2 版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05. 2

(钱穆作品系列)

ISBN 7-108-02238-9

I. 庄… II. 钱… III. 道家-哲学思想-研究
IV. B223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9600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封面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	100010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京海印刷厂
版 次	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
字 数	244 千字 图字 01 - 2002 - 1303
印 数	0,001 - 5,000 册
定 价	28.50 元

题 记

上卷中《关于〈老子〉成书年代之一考察》，成于1923年夏。《再论〈老子〉成书年代》，成于1932年春。此两篇，曾与拙著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中《老子辨》一篇合刊，由上海大华书店印行，书名《老子辨》。

1945年，在成都。成《比论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》及《记魏晋玄学三宗》共两篇。1948年，在无锡江南大学。是年春，成《郭象〈庄子注〉中之自然义》一篇。冬，草创《庄子纂笺》，越年脱稿。

1953年在香港，成《庄》《老》两小传，及《道家政治思想》，共三篇。

1955年，成《庄老的宇宙论》，《王弼郭象注易老庄用理字条录》，又《庄老太极无极义》，共三篇。

1956年，成《释道家精神义》，及《〈庄子〉外杂篇言性义》，共两篇。

1957年，成《〈老子〉书晚出补证》，及《王弼论体用》，共两篇。上述十五篇合成今书，前后计之，已历三十五年矣。

诸文多数均曾分别于各杂志刊载，此次汇合付印，逐篇均有修订增润。然大体各仍旧贯，未能竟体改写。语或重出，亦恐有小小相牴牾处，幸读者谅之。

本书专为讨论庄、老两家之思想，而辨订其先后。其关于庄、老两家之生卒年世，及历史传说之种种考订，则均详见于拙著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。

拙著与本书可互相发明参证者，除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外，尚有《国学概论》，《中国思想史》，《墨子》，《惠施、公孙龙》诸书，幸读者参阅。

此书于1957年10月，由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初版发行。1971年，又在台北再版发行。今又补入三篇，一、《三论〈老子〉成书年代》，二、《〈庄子〉书言长生》，三、《庄老与易庸》，皆早年之作，今一并收入此集，全书共十八篇。交台北三民书局出版。特识数语，以告读者。

1990年5月

自序

近人论学，好争汉宋。谓宋儒尚义理，清儒重考据，各有所偏，可也。若立门户，树壁垒，欲尊于此而绝于彼，则未见其可也。清儒以训诂考据治古籍，厥功伟矣。其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，说非不是。惟求通古书训诂，其事不尽于字书小学，尔雅说文，音韵形体，转注假借之范围。此属文字通训，非关作家特诂。如孔孟言仁，岂得专据字书为说？即遵古注，亦难惬当。阮元有《论语论仁》篇，《孟子论仁》篇，遍集论孟仁字，章句缕析，加以总说，用意可谓微至。然所窥见，仍无当于孔孟论仁之精义。昔朱子告张南轩，已指陈其症结所在。此必于孔孟思想大体，求其会通，始可得当。而岂寻章摘句，专拈论孟有仁字处用心，谓能胜任愉快乎。又况抱古注旧训拘墟之见，挟汉宋门户之私，则宜其所失之益远矣。

清儒于考据，用力勤，涉猎广，而创获多。然其大体，乃颇似于校勘辑逸之所为。蹠实有余，蹈虚不足。施于每一书之整理，洵为有功。其于古人学术大体，古今史迹演变，提挈纲宗，阐抉幽微，则犹有憾。此必具综合之慧眼，有博通之深识，连类而引伸之，殊途而同归焉，此亦一种考据，岂仅比对异同，网罗散失之谓乎。清儒于小学音韵，造诣深者，差已睨此境界。其他犹悬然也。

清儒亦有言，非通群经，不足以通一经。推此说之，非通诸史，亦不足以通一史。非通百家，亦不足以通一家。清儒考据，其失在于各别求之，而不务于会通。章实斋号为长于平章学术，其分别清儒为学途辙，谓浙西尚博雅，浙东贵专家。其实博涉必尚会通，否则所涉虽博，而仍陷于各别之专。清儒往往专精一史，专治一子。一史一子已毕，乃又顾而之他。故所繁称博引，貌为博而情则专，实未能兼综诸端，体大思精，作深入会通之想也。

衡量清学一代所得，小学最渊微。整理经籍，瑕瑜已不相掩。至于子史两部，所触皆其肤外，而子部为尤甚。此正其轻忽于义理探求之病。然求明古书义理，亦岂能遂舍训诂考据而不务？后有作者，正贵扩其意境，广其途辙，就于清儒训诂考据已有业绩，而益深益邃，庶有以通汉宋之囿，而义理考据一以贯之，此则非争门户修壁垒者之所能知也。

《老子》为晚出书，汪容甫已启其疑。然汪氏所疑，特在《史记》所载老子其人其事，固未能深探本书之内容。梁任公

推汪氏意，始疑及《老子》本书。所举例证，亦殊坚明。然梁氏亦复限于清儒旧有途辙，未能豁户牖而开新境。且《老子》书晚出于《论语》，其说易定。而其书之著作年代，究属何世，庄老孰先孰后，则其难立。余之此书，继踵汪梁，惟主《老子》书犹当出庄子惠施公孙龙之后，则昔人颇未论及。持论是非，当待读者之自辨。而本书所用训诂考据方法，亦颇有轶出清儒旧有轨范之外者。此当列诸简端，以告读吾书者也。

《老子》书开宗明义，即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以清儒训诂小学家恒见遇之，若不烦有训释。而实不然。先秦诸子著书，必各有其书所特创专用之新字与新语，此正为一家思想独特精神所寄。以近代语说之，此即某一家思想所特用之专门术语也。惟为中国文字体制所限，故其所用字语，亦若惯常习见。然此一家之使用此字此语，则实别有其特殊之涵义，不得以惯常字义说之。

韩昌黎有言，道其所道，非吾之所谓道。《老子》书开宗明义，道名兼举并重。即此一名字，其涵义，亦非孔子《论语》必也正名乎之名字涵义，所可一例而视。若深而求之，老子书中所用道名二字，不惟其涵义与论孟有别，并亦与《庄子·内篇》七篇所用道名二字涵义有不同。此正庄老两家之所以各成其为一家言也。此非熟参深通于庄老两书之全部义理，将无法为此二字作训释。清儒惟戴东原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为能脱出训诂旧轨。焦里堂阮芸台继踵，亦多新见。然清代学术大趋，则终在彼不在此。抽其端，未畅其绪，故其所谓训诂明而义理明

者，亦虚有其语耳。

今试就此名字，比观庄老两书，分析其涵义内容，较量二氏对此名字一观念之价值评判，则有一事甚显然者。《庄子》内篇七篇，每兼言名实，此与孟子略相似。兼言名实，则每重实不重名。故《庄子》曰：名者、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此庄子之无重于名也。而《老子》书则道名兼重。有常道，复有常名。又曰：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，以此。其名不去，即常名也。正因有此等常名，乃可使吾知众甫之状。然则常名者何指，是即吾所谓此乃一家思想所特用之一种新语也。即常字，古经籍亦不多见。后世重视此常字，实承《老子》。读古书者，贵能游情于古作者之年代，其心若不知有后世，然后始可以了解此古书中所新创之字语，及其所影响于后世者何在。否则亦视为老生常谈，而不知我之沉浸染被于此老生常谈中者之深且厚也。俞曲园《诸子平议》，破此常字为尚字。此正其锢蔽于清儒小学训诂家之恒习常见，乃不知此常字乃老子所创用。故老子又郑重申言之，曰：不知常，妄作凶，亦岂可以尚字说之乎？

必欲求《老子》书中此常名一语涵义所指，则仍须一种训诂，而此种训诂，则仍必凭于考据。清儒解经训字，或凭字书，或凭古注。因其重古注，遂重家法。而诸子书固无家法可循。为诸子作注，其事较晚起。注《老子》者莫著于王弼。弼之注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曰：无名则是其名也。既曰无名，则并名而不立，乌得谓其名不去乎？是王注之未谛也。今以《老子》本

书注《老子》，则所谓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者，此必为《老子》书开端所谓之常名可知矣。

然则何者乃始为常名？当知名实兼言，此为孟庄时代之恒语。一名指一实。此一实即一物也。惟由庄子意言之，万物在天地间，若驰若骤，如庄周之与胡蝶，鼠肝之与虫臂，化机所驱，将漫不得其究竟。故名无常而不足重。老子则不然。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此所谓先天地生，即首章无名天地之始也。可以以为天下母，即首章有名万物之母也。谓之混成，则无可分别，故曰不可名。谓之不改，则常在不去，乃终不可以无名，故又强而为之名。而道则终是不可名者。故既曰大道无名，又曰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则道者乃无可名而强为之字，字与名之在《老子》书，涵义亦有别。今若进而问何者始为可名？在老子意，似谓有状者乃始可名。状即一种形容也。今若强为道作形容，则曰大，曰逝，曰远，曰反，此皆道之状也。道既有状，故得强为之名。

然则名字之在《老子》书，其重要涵义，乃指一种物状之形容，因于有状而始立。状字在《老子》书，又特称曰象。老子曰：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然则就《老子》书释《老子》，名当有两种，一为物体之名，一为象状之名。物之为物，若驰若骤，终不可久，故

其名不去者，实是一种象状之名，而非名实之名也。故曰《老子》书中名字，乃与《庄子》书中名字涵义所指有大别也。

老子言道演化而生万物，其间有象之一境，此亦老子所特创之新说，为《庄子》书所未及，故象之一字，亦《老子》书所特用之新名也。若循此求之，《老子》书中所举有无曲全，大小高下，动静强弱，雌雄黑白，荣辱成败，种种对称并举之名，实皆属象名，非物名也。以近代语释之，此等皆为一种抽象名辞。然则老子之意，乃主天地万物生成，先有抽象之表现，乃始有具体之演化者。《易·系传》承之，故曰：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所谓易，即道体也。所谓仪，亦象也。又曰：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天必先于地，故知象亦先于形。今试再浅释之。天下凡黑之物，皆在演化中，皆不可久，皆可不存在而可去。独黑之名则较可常在而不去。故黑物非可常，而黑名较可常。老子之意，似主天地间，实先有此较可常者，乃演化出一切不可常者。而王弼之说《老子》，乃主天地万物以无为体，以无为始，又必重归于无，此实失《老子》书之真意。郭象注庄，则已知王弼体无之论之不可安而力辨之矣。然余之此辨，则非自持一义理，谓老子是而王弼非。余实仅为一种考据，一种训诂，仅指王弼之说之无当于《老子》书之本意耳。然试问若果舍却训诂考据，又何从而求老子王弼所持义理之真乎？

老子谓天地间惟有此较可常者，故人之知识乃有所凭以为知。故曰：不出户，知天下。不窥牖，见天道。庄子认为天道不可知，而老子则转认为可知。试问其何由知？老子亦已明言

之，曰：执大象，天下往。以天地万物一切演化之胥无逃于此大象也。故曰：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，以此。此乃《老子》书中所特别提出之一种甚深新义，所由异于庄周。居今而知此两家持论之异，则亦惟有凭于考据训诂以为知耳。

上之所述，特举《老子》书开宗明义两语为说，以见欲明古书义理，仍必从事于对古书本身作一番训诂考据工夫。此即在宋儒持论，亦何莫不然？如程朱改定《大学》，阳明主遵古本，此即一种有关考据之争辨也。又如朱王两家训释格物致知互异，此即一种有关训诂之争辨也。居今而欲研治宋儒之义理，亦何尝不当于宋儒书先下一番训释考核之工乎？孟子曰：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。欲知圣人之心，必读圣人之书。欲读圣人之书，斯必于圣人书有所训释考据。否则又何从由书以得其心？象山有言曰：六经皆我注脚，试问何以知六经之皆为我注脚乎？岂不仍须于六经有所训释考据？象山又曰：不识一字，我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，然固不谓不识一字亦能读古人书，可以从书得心，用以知古人义理之所在也。

然治《老子》书，欲知《老子》书中所持之义理，其事犹不尽于上述。孟子曰：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所以论其世也。读《老子》书，考核《老子》书中所持之义理，而不知老子其人，则于事终有憾。不幸老子其人终于不可知，则贵于论老子之世。以今语说之，即考论《老子》书之著作年代也。虽不知其书之作者，而得其书之著作年代，亦可于此书中所持之义理，更有所了然矣。

考论一书之著作年代，方法不外两途。一曰求其书之时代背景，一曰论其书之思想线索。前者为事较易，如见《管子》书有西施，即知其语之晚出。见《中庸》有今天下，车同轨、书同文，行同伦之语，即知其语当出于秦人一统之后。梁任公辨老子书晚出，亦多从时代背景着眼。余定《老子》书出庄周后，其根据于《老子》书之时代背景以为断者，所举例证，较梁氏为详密，然就方法言，则仍是昔人所用之方法也。惟余论老子书之思想线索，则事若新创，昔人之运用此方法者尚鲜，爰再约略申说之。

人类之思想衍进，固有一定必然之条贯可言乎？此非余所欲论。余特就思想史之已往成迹言，而知当时之思想条贯，则确然有如此而已。以言先秦，其人其世其书，有确可考而无疑者，如孔子，墨子，孟子，庄周，惠施，公孙龙，荀子，韩非，吕不韦，皆是。就于其人其世先后之序列，而知其书中彼此先后思想之条贯，此亦一种考据也。然先秦诸家著书，亦有不能确知其书之作者与其著作之年代者，如《易传》，《中庸》，如《老子》，如《庄子》外杂篇皆是。然其人虽不可知，而其世则约略尚可推。此于考求其书时代背景之外，复有一法焉，即探寻其书中之思想线索是也。何谓思想线索？每一家之思想，则必前有承而后有继。其所承所继，即其思想线索也。若使此一思想在当时，乃为前无承而后无继，则是前无来历，后无影响。此则决不能当然显于世而共尊之为一家言。故知凡成一家言者，则必有其思想线索可寻。

探求一书之思想线索，必先有一已知之线索存在，然后可据以为推。前论思想条贯，即此各家思想前承后继之一条线索也。就其确然已知者，曰孔墨孟庄惠公孙荀韩吕，综此诸家，会通而观，思想线索，亦既秩然不可乱。今更就此诸家为基准，而比定老子思想之出世年代，细辨其必在某家之后，必在某家之前。此一方法，即是一种新的考据方法也。

思想线索之比定，亦有甚显见而易决者。如《论语》重言仁，而老子曰：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。又曰：天地不仁。此即老子思想当晚出于《论语》之证也。《墨子》书有《尚贤》篇，而老子曰：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此又老子思想当晚出于墨子之证也。世必先有黑之一语与黑之一观念之存在，乃始有非黑之语与非黑之观念之出现，故曰此显见而易定也。

循此推之，庄惠两家，皆言万物一体，庄子本于道以为说，惠施本于名以立论。今《老子》书开宗明义，道名兼举并重，故知老子思想又当晚出于庄惠两家也。然则先秦道家，当始于庄周，名家当始于惠施，不得谓老子乃道名两家共同之始祖。老子特综汇此两家，而别创一新义耳。此种思想线索之比定，则较为深隐而难知。

然更有其深隐难知者。试再举例。如老子曰：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此三者不可致诘，故混而为一。此一条立论甚新奇，遍求之先秦诸家思想，乃甚少同持此意见者。有之，惟公孙龙之《坚白论》。公孙龙主坚白可以外于石而相离，故曰：拊石得坚而不得白，视石得白而不得

坚,故坚白石可二不可三。就常识论,石是物体之名,坚白乃象状之辞。物体是实,象状则虚。石为一实体,而兼包坚白二象状。故坚白相盈,不相离也。公孙龙顾反其说。循公孙龙之意,岂不象状之名,可以脱离于物之实体而独立自在乎?《老子》书正持此义。常识谓所视所听所拊,皆必附随某一物之实体。老子似不认此说,乃谓所视所听所拊,本皆相离,各别存在,乃由于不可致诘,故遂混而为一焉,此非其立论之有与公孙龙相似乎?

详老子之意,天地最先,惟有一物混成,是即其所谓道也。道之衍变,先有象状,再成具体。如此言之,则抽象之通名当在先,个别之物名当在后。浅说之,老子若谓:天地间当先有黑白之分,乃始有白马白石白玉白雪白羽之分。黑白之分较先较可常,而马石玉雪之分,则较后而较为不可常。故《庄子》书屡言物,而《老子》书屡言名,屡言象,更不言物。此两书之显然异致也。盖庄子虽屡言于物,然庄子实主未始有物。既谓未始有物,故老子承之,乃改就一切象状之可名者以为说。此庄老思想大体之不同,亦可以由此而推也。

盖名之为用,愈具体,则可析之而愈小。愈抽象,则可综之而愈大。惠施分言大一小一,即所以推论万物之一体。而公孙龙变其说,谓坚白石相离不相盈,则彼彼止于彼,此此止于此,天地间万名,各离而自止于其所指。而老子又变其说,乃成象名在先,物名在后,以证其天地之原始于不可名状之道。然则老子之思想,岂不与公孙龙有一线索可寻乎?

公孙龙又曰：物莫非指，而指非指。若以公孙龙书与《老子》书互参，则公孙龙之用此指字，亦犹《老子》书之创用一象字也。就人言之曰指，就物言之曰象。凡天地间一切物之抽象之名，此两家皆认其可以离物而自在，此皆人之所由以知于物而就以指名于物，象状于物者也。如曰此物白，白即此物之可指目之一端，亦即此物之可形容，可名状之一象也。故知老子之说，实与公孙龙相近。而公孙龙之说，则显为承于惠施而变者。而庄子则讥惠施，曰：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然则，坚白之说，惠施唱之，公孙龙承之，所以成为当时之名家。庄子不喜其说，主于观化而言道，所以自成为当时之道家。今老子乃承于庄惠公孙之说而又变，遂兼揽道名两观念，而融会为说。又不言坚白，而更称夷希微，则益见为抽象，此即老子之所谓玄之又玄也。即此一端，岂非思想线索之犹可微辨而深探之一例乎？凡此云云，则必博综会通于先秦诸子思想先后之条贯而后始见其必如是，故曰：非通诸子，则不足以通一子也。

言清儒考据者，率盛推阎百诗之《尚书古文疏证》。然《古文尚书》乃有意作伪，故有伪迹可寻。《老子》书则自抒己意，彼非有意作伪，又何从抉发其伪迹？故余书之辨老子，与阎氏之辨《尚书》古文亦复不同。盖余之所辨，特亦孟子之所谓求知其人，而追论其世。作意不同，斯方法亦不得不随而变也。昔宋儒欧阳修，疑《易传》，疑河图洛书，其语人曰：余尝哀夫学者，知守经以笃信，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。自孔子没，至今二千岁，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，又二千岁，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

也。又二千岁，将复有一人焉。然则同者至于三，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。六经，非一世之书。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。以无终极视数千岁，顷刻耳。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。《老子》亦非一世之书。其书固不伪，而说之者多伪。以有伪说，遂成伪书。《老子》书至今亦逾二千岁矣，至于余而始为此辨，窃亦有意自比于欧阳。则余说之成为定论，岂能不远有待于后人乎？至于汉宋门户之辨，则固不以厝余怀也。